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 “差异化发展” (1881-1937)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Market Towns along
the North China Railways, 1881-1937

熊亚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 “差异化发展” (1881-1937)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Market Towns along
the North China Railways, 1881-1937

熊亚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1881—1937 /
熊亚平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3264 - 0

I. ①华… II. ①熊… III. ①城市化 - 研究 - 华北地
区 - 1881—1937 IV. ①F299.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8352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1881—1937）

著 者 / 熊亚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丽丽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80千字

版 次 /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264 - 0

定 价 / 10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一 选题缘起	1
二 概念界定	7
三 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19
四 创新及写作难点	31
第一章 晚清时期华北集镇发展概况	37
一 集镇的类型与层级	37
二 集镇的数量与规模	47
三 集镇的分布与形态	72
四 小结	94
第二章 铁路建设运营与集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95
一 铁路车站的设立	95
二 其他运营管理机构设置	100
三 铁路运营管理制度的推行	106
四 集镇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12
五 小结	123
第三章 铁路开通后沿线集镇时空格局的演变	125
一 集镇类型与层级的变化	125
二 集镇数量与规模的变动	144
三 集镇分布与形态的演变	157
四 小结	186
第四章 铁路沿线集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产业与社会组织为例	189
一 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的产业发展与社会组织演变	189

二	工矿业型集镇的产业发展与社会组织成长	201
三	工商业型集镇的产业发展与社会组织变动	217
四	小结	228
第五章 铁路沿线集镇的文化嬗变		
	——以教育发展为例	230
一	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教育的初兴	231
二	工矿业型集镇教育的发展	238
三	工商业型集镇教育的起步	249
四	小结	261
第六章 铁路沿线集镇的制度变迁		
	——以管理体制为例	263
一	影响集镇管理体制变迁的制度性因素	263
二	交通运输枢纽型集镇管理体制的变迁	272
三	工矿业型集镇管理体制的变动	277
四	工商业型集镇管理体制的变化	285
五	小结	294
第七章 铁路沿线与非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之比较		
一	华北非铁路沿线集镇概述	296
二	铁路沿线与非铁路沿线集镇的比较	320
三	小结	336
结 论		
一	铁路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的特征	338
二	铁路在沿线集镇“差异化发展”动因中的地位	342
三	铁路沿线集镇的“差异化发展”与华北城镇化进程	349
参考文献		
后 记		

绪 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等发展目标和战略构想的提出,城镇化受到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尽管人们对某一区域城镇化的具体路径选择的认识不同,但已形成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重要共识。集镇作为小城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农民迈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①由于当前的华北城镇尤其是中小城镇,有相当一部分由集镇发展而来,因此,开展近代华北集镇发展研究对推进华北区域城镇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部分将概述本书的选题缘起、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创新及写作难点。

一 选题缘起

作为近年提出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京津冀乃至华北城镇体系的失衡,即北京^②、天津两个城市规模巨大,次级中心城市数量偏少,小城市数量较多。细察之下,又可以发现,地处京津冀范围内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廊坊,以及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境内的枣庄、焦作、漯河、驻马店、阳泉等各级中心城市,均曾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华北铁路沿线集镇。因此,华北铁路沿线集镇与区域城镇体系变动及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应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① 参见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第162—192页;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农业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1—32、353—360页。

② 北京在1928年后改名北平,本书为便于行文,除专有名词和引文外,统一作“北京”。

虽然关于华北集镇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时至今日,华北集镇研究却远逊色于江南市镇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南区域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在江南区域史研究中,“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又是一大热点。与之相比,关于华北及长江中游、西南、苏北等地区市镇的研究虽然已经展开,但成果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差距。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应是其市镇工商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以华北为例,在明清时期的山西泽州,“镇的共性可以概括为‘巨村为镇’,即村镇统一体”^①。晚清时期,直隶省^②武清、栾城、青县、望都等州县的村落仅有少数是“数百户上千户的大村,绝大多数只是数十户以至数十户的小村”^③。其中可以称为“集镇”的村庄中“有店,隔数日周围十数村、数十村村民前来赶集,确与无店无集的村庄不同。但村中数百户而只商店寥寥数家,而且商店主多不脱离农业”。^④20世纪30年代,冀鲁豫三省集镇人口规模和商业规模普遍较小。在三省72县206个集镇中,人口超过16000人者仅有10个,占5%;8000—15999人者有15个,占7%;4000—7999人者有39个,占19%;2000—3999人者有68个,占33%;2000人以下者有74个,占36%。山东省44县123个集镇中,仅有11个商号数在200家以上,商号数在50家以下者多达89个,占到72%以上。河南省7县97个集镇中,商号数在100家以上者仅有5个,商号数在50家以下者多达90个,占到92%以上。^⑤不仅商号数量较少,而且商户在集镇居民中所占比例也比较低。据统计,1937年前河北、山东两省35个集镇的居民中,“经商户所占比重悬殊。高者达百分之三四十,最低者仅及百分之一二,35镇平均则为11%”。^⑥由此可见,近代华北市镇的工商业发展水平,与李伯重等人提出的“市镇

① 赵世瑜:《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6页。

② 直隶1928年后改称河北,本书为行文方便,凡涉及清末时期时,采用“直隶”一词;论及民国时期时,则使用“河北”一词。

③ 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78页。

④ 王庆成:《晚清华北村镇人口》,《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7页。

⑤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86—188页。

⑥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213页。

工商业中的经常性就业人口,往往超过其正式居民的数量。由于市镇居民人数较多,其‘非农业化’的程度较高,所以近代江南的市镇属于城市地区而非农村地区。明清江南的情况也与此相似”^①的判定之间,仍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华北等地市镇与江南市镇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工商业发展水平上,而且表现在名称上。“交易于市者,南方谓之趁墟,北方谓之赶集,又谓之赶会,京师则谓之赶庙。”^②“南人曰市,北人曰集,贩夫、贩妇之利也”^③,“岭南谓市为墟……西蜀谓之亥……山东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于其日聚焉,谓之赶集。岭南谓之趁墟”^④。

由此可见,“集镇”这一名称既体现了北方特色,又契合了华北大多数市镇工商业发展水平不高、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较小的实际,因此,本书以“集镇”代替“市镇”作为主题词。

有学者曾指出,市镇“不论是依河还是靠路设市,其本质相同,即都是对各自地域交通状况的依赖和利用。而寻求交通结点,依赖并利用交通网络以实现便民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商业利润正是市镇本质特征的反映”^⑤。与之相似,集镇发展与交通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1937年前的华北集镇不同于江南市镇的一个突出特征,应在于铁路的显著影响。其一,在从翰香等人列出的20世纪20—30年代冀鲁豫50个“中心市镇”中,有15个设有铁路车站,占到30%。其中,张店、漯河、驻马店、石家庄等镇因铁路而兴,周村、道口、清化、兴济等镇也受到铁路的明显影响。其二,除这15个集镇外,华北因铁路而兴或受铁路影响较大的集镇还有唐山、^⑥秦皇岛、廊坊、平地泉、坊子、杨家庄、焦作、周口店、

① 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页。

② (清)阙名:《燕京杂记》,骈宇騫整理《旧京遗事·旧京琐记·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第120页。

③ 道光《定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843页。

④ 光绪《恭城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505—506页。

⑤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第303页。

⑥ 由于唐山、石家庄等新兴城市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由乡村向集镇演变的阶段,直到1927—1937年,才跻身小城市行列,加之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本书仍将其归入集镇行列。

坨里、开平、芦台、杨村、长辛店、琉璃河、清风店、南口、辛店、观音堂等。其三,除这些较大集镇外,为数更多的设有铁路车站或临近铁路车站的小集镇也受到铁路或多或少的影响。^①其四,上述铁路沿线集镇中,有一部分在其后数十年中成长为华北地区各级中心城镇(如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地级以上城市唐山、秦皇岛、漯河、驻马店、焦作、廊坊以及芦台、杨村等县城),或中心城镇的辖区(如周村、坊子、张店等)。这表明铁路沿线集镇在华北集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对区域社会变迁、城镇体系变动及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书的选题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富有现实意义。

就学术价值而言,由于集镇是一种在工业化、城镇化、城乡关系重组过程中勃然兴起的,具有“中介性”的,“二、三、一次产业活动共存”的社会聚落系统,^②因此本书对集镇的研究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近代华北城市史、乡村史、城乡关系史和铁路沿线社会变迁等领域的研究。在城市史方面,虽然已有学者初步探讨了近代华北城镇体系的变动,^③但个案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和青岛、济南等中等城市,关于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等小城镇和集镇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④城镇体系研究仍以人口等级规模为重点,城镇职能组合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及城市间联系与城镇网络等方面的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因此,本书关于集镇类型、层级、规模、分布、形态等的研究,将有益于城镇体系研究的深入。在乡村史方面,由于“集之盛地曰镇,行商之外,亦有坐贾

① 参见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7;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1934;《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按,《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刊行时有《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书》和《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两个名称,编者有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和北宁铁路局两种说法,本书统一为北宁铁路经济调查队编《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刊行时也有《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和《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两个名称,本书亦统一为《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

②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1—4页。

③ 罗澍伟:《试论近代华北的区域城市系统》,《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60—64、71页;周俊旗:《关于近代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39、106—108页;张利民:《近代华北城市人口发展及其不平衡性》,《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89—203页。

④ 参见本书“相关研究成果概述”部分。

以设肆焉……物产之丰者，政府课税以稽其数之出入，是与农村经济关系至大且巨”^①，因此集镇亦可成为观察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窗口，“可窥该地商业发达与否”，“可察知该地有何特产”，“可察知其地人民之生活状况”^②。于是，本书关于华北集镇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文化（以教育为例）的研究便有助于考察和认识华北乡村社会变迁及其近代化进程。在城乡关系方面，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少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但随着华北铁路沿线集镇的迅速发展，到1937年前，唐山、石家庄、秦皇岛、焦作、漯河、驻马店等集镇已成为介于城市与村庄之间的重要“一元”。这些集镇不仅成为天津、北京、汉口、开封等大中城市与铁路沿线众多县城、集镇、村庄之间商品流通和人员往来的枢纽和中转地，而且在发展中分别形成了“农村地域上的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并存（唐山、焦作、石家庄等）和“位于城市地域上的城市传统工业区和新兴经济区”共同发展（漯河、驻马店等）的格局。这表明为研究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和城市化的学者所瞩目的城乡三元结构（城市、集镇、农村，^③或城市、城乡边缘区、乡村^④）或“双重二元经济结构”^⑤，在1937年前的华北地区已出现端倪。因此，本书的研究亦将有助于揭示近代华北城乡关系模式及城乡经济关系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化。在铁路沿线社会变迁方面，近年来问世的多数同类成果，在研究视角上以铁路与城市、乡村或区域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为切入点；在研究内容上以铁路沿线若干典型城市为对象，通过分析铁路对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充等方面的影响，揭示铁路对近代华北区域城镇化进程及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其最大优点是能够通过典型个案的剖析，揭示铁路对某些城镇或乡村社会变迁（如产业

① 民国《任平县志》卷2《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1页。

② 河北省政府建设厅编印《调查报告》第4编《工商》，1928，第69页。

③ 参见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2页。

④ 参见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第301、324页。

⑤ “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指涉的是当前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基本内涵是：“旧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逐步转向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双重二元结构，即位于农村地域上的农村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以及位于城市地域上的城市传统工业区和新兴工业区。”见郑弘毅主编《农村城市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4—15页。

结构、社会结构等)的影响。主要不足则有:一是从铁路影响的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本身便蕴含着走向“铁路决定论”的危险;二是由于铁路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间接影响,且影响程度难以准确把握,因此“铁路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的研究难以准确地揭示铁路对社会文化嬗变的影响,也就难以全面地展示铁路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角色。本书将主题由“铁路与沿线集镇发展”转变为“铁路沿线集镇”,不仅意味着重点由“铁路与集镇发展之间的关系”变为“集镇”本身,而且使原本处于中心和焦点位置的铁路变为区分不同集镇类型的一个标识和影响集镇发展的因素之一。这一转变将不仅有助于开展铁路沿线集镇社会文化嬗变的研究,而且能够更客观地展现铁路与沿线集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走向“铁路决定论”的危险。

就现实意义而言,一方面,本书研究所及的多数集镇在其后数十年中仍是华北集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关于近代华北集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客观地认识当前华北集镇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乡村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社会文化嬗变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好集镇发展规划,更好地服务乡村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涉及的一部分集镇在其后数十年中成长为华北重要城市(或重要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本书关于近代华北集镇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以上城市发展史研究的开展,而且对于认识当前的华北社会变迁、城镇体系变动及城镇化进程,制定切合华北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促进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等,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将考察时间的上限确定为1881年,是由于当年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建成通车后,胥各庄成为铁路沿线集镇,自此,华北集镇始有铁路沿线集镇与非铁路沿线集镇之别;将考察的下限定在1937年,则是由于当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集镇发展和社会变迁进入非常状态。此外,本书在探讨铁路开通前集镇发展、铁路开通后集镇时空格局的演变、集镇管理体制变迁等重要论题时,将1911年作为重要时间节点,而非某条标志性铁路竣工或通车的时间。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量:其一,虽然唐胥铁路于1881年建成通车,但京奉、京汉、京绥、胶济、正太、道清等铁路干线到20世纪

初才全线竣工通车,津浦铁路到1911年时才全线贯通,至此,华北铁路运输网络才初步形成并对集镇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二,1911年是可以利用地方志等史料对华北集镇进行分时段统计分析的较为恰当的时间节点之一。

二 概念界定

本书将要涉及的重要概念有集镇、铁路沿线地区、铁路沿线集镇、华北、乡村、社会变迁、城镇化、城镇体系、“差异化发展”等。

集镇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内涵则与集市、镇、市镇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之处。集市在中国起源颇早,“易曰,庖犧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名[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在关于集市概念的界说中,杨庆堃和李正华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杨氏认为:“所谓市集,就在一定的地点上,每一定时间距离所举行的临时经济交换组织。……所谓临时的经济交换组织,便是这种组织一方面是以经济上的交换为目的,但这种交易上的活动只举行于习惯所指定的时间,过了这习惯的时间以后,买者和卖者都各自离散,这指定地点上的交易活动即行终止,直至轮到第二次指定的时间再来时,才重行集合继续活动。”^②李氏强调:“集市是人们贸易有无和商贾聚集的场所。所谓乡村集市,它必须具备如下几个要素:第一,集市的交易者多为农村居民,集市中虽然也可能有城市居民或专业商人参与交易,但数量不可能多,不占主要成份;第二,集市中交易的物品主要是农产品;第三,集市中交易者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进行余缺调剂,而不是为了牟利。……根据上述对乡村集市的界定,我们可以将近代意义的县城以下的市、镇、集、墟、场等,统统归之于乡村集市的范畴。”^③

镇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于集市,“通典曰,镇将,后周之通班也,隋

①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8,商务印书馆,1937,第316页。

② 杨庆堃:《邹平市集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4,第5页。

③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第22页。

亦曰镇，唐分上中下三等，历代未闻，疑镇始于宇文周代也”^①。宋代以后，镇的性质有所变化，“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②。“其市廛会聚之区曰镇”^③。“凡户多而有市集者为镇”^④。

“集”与“镇”连用而形成的“集镇”一词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地方志中较为常见，如康熙《顺义县志》载，该县“更有集镇数处，分布四乡”^⑤。乾隆《夏津县志》称，该县“在乡集镇共二十有五处”^⑥。光绪《玉田县志》曰：“近闻城乡各集镇地面颇有不法奸商开设钱铺……”^⑦。光绪《浙川直隶厅乡土志》载：“城东北三十里有蛮子营街，五十里有上集街，七十里有水田街，皆小集镇也。”^⑧民国《沧县志》称：“然商之大别为三级……中者为集镇铺户。”^⑨在关于集镇概念的界说中，杨懋春、邹农俭、费孝通、邹逸麟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杨懋春指出：“以中国大陆华北的平原论，在一块约计一百平方里的农业区域上，会呈罗棋布般的散列十余个或大或小的农村。在这些农村之间，通常在一个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之处，会有一个集镇。一个集镇是区域内各农村中农民前往购买工作用具与生活用品的地方，也是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多余农产品、家畜、家禽以及手工艺品的地方。”^⑩邹农俭等认为：“在城乡两大社会聚落系统之外，还客观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中介性’社会聚落系统，这就是二、三、一次产业活动共存的，其主体部分人口规模在二千到五万间的‘集镇’社会聚落系统。……与‘小城镇’相比，‘集镇’这一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同质性。……第二，客体

①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7，第251页。

② 高承撰、李果订正《事物纪原》卷7，第251页。

③ 乾隆《蒲台县志》卷2《村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8册，第449页。

④ 民国《桓台志略》卷2《法制》，《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8册，第333页。

⑤ 《形胜》，康熙《顺义县志》卷2，第10页a。

⑥ 乾隆《夏津县志》卷2，《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19册，第34页。

⑦ 光绪《玉田县志》卷5，《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2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55页。

⑧ 光绪《浙川直隶厅乡土志》，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年影印本，第215页。

⑨ 民国《沧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680页。

⑩ 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0，第51页。

性。……第三，稳定性。”^① 费孝通指出：“如果把‘城镇’这个名词用来指作为农村中心的社区，从字义上看，它似乎应当属于城的一方，而实际却是乡的中心。为了避免这种因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不如称这种社区为‘集镇’。”“我主张把农村的中心归到乡的一边。但也可以考虑在城乡之间另立一格，称之为镇……镇字旁还得加个字，要加就不能再用城或乡，所以还是可以考虑称为‘集镇’。”^② 邹逸麟认为：“在清代，所谓‘镇’并不是县以下一级行政机构，也不是地方政府为管理商贸的一种建制。集镇原先只是一种乡间商业比较繁荣、人口比较集中的一种称为市或集（南方多称市，北方多称集）的聚落。”^③

“市”与“镇”连用而形成的“市镇”一词在地方志中亦较为常见，如康熙《高唐州志》“市镇”条曰：“古者日中为市……镇又市之大者。”^④ 咸丰《武定府志》载，青城县“市镇凡六……集凡六，分日各镇轮设”，阳信县“市镇凡一十有九……集凡二十有一，分日各务镇轮设”，海丰县“市镇凡八……集凡一十有五，分日各庄镇轮设”，乐陵县“市镇凡一十有三……集凡四，城内四街二五七十分日轮设，余在各镇”。^⑤ 光绪《惠民县志》曰：“同井而处者聚于乡村，受廛而居者萃于市镇，莫不各安其业，本末相资。”^⑥ 民国《西平县志》曰：“凡商人集会交易之所，通称市镇。”^⑦ 在关于市镇概念的界说中，奚东曙、邓亦兵和任放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奚氏从市镇与都市区别的角度指出：第一，市镇仅仅是几个乡村的贸易集中地，商店只有零售而无批发，纵有批发，也只是一两种或少数货物的批发。第二，市镇交通不如都市便利。第三，市镇中的金融组织没有都市的大。第四，市镇近代工业的数量和规模远比都市小。第五，市镇中的专门人才比都市少。^⑧ 邓氏在比较清代市镇

①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4—6页。

②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233页。

③ 邹逸麟：《清代集镇名实初探》，《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65页。

④ 康熙《高唐州志》卷1《市镇》，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孤本方志选》第2辑第2册，线装书局，2001年影印本，第60—61页。

⑤ 咸丰《武定府志》卷7《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1册，第92—93页。

⑥ 光绪《惠民县志》卷5《乡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22册，第306页。

⑦ 民国《西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56页。

⑧ 奚东曙：《都市发展之社会学观》，《都市与农村》创刊号，1935年4月，第12—13页。

与集、场、墟，市镇与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市镇的概念。她认为市镇与集、场、墟的区别表现在六个方面：集、场、墟都没有城墙，或四栅，街市规模比较小；有的集场也有店铺，但数量明显比市镇少；集场的设施比市镇简单；参与集场交易的人员，与商贾辐辏的市镇大不一样；市镇中的商品多，种类齐全，而集场中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市镇中有众多商铺，商民整日交易，无时间、集期的限制，而集场一般都有一定的集期，一定的时间。她指出市镇与城市的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城市街巷多，市廛繁盛，商民稠密，各种设施齐备，整体规模都比较大。其二，城市是地方政府所在地，有行政机构建置；有官员、绅士居住；有营兵驻扎，是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区，因此其经济兴衰往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清代的市镇定义一般具有两个因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大概是较大市镇；只具备第一个条件者，大概是中、小市镇。^①任氏在论著中多次对市镇概念进行界说，如“市镇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商业聚落。从市场体系的角度看，农村市镇包括市和镇两大类，前者包括农村定期市和常设市，后者包括镇一级的各类专业市场”^②。“本书所言之市镇，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③

以上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界说对厘清集市、集镇和市镇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颇有裨益。从中可以看到，集市与集镇的主要区别在规模上，即集市规模较小、人口较少、店铺较少或没有店铺，而集镇规模较大，“行商之外，亦有坐贾以设肆焉”^④；集镇与市镇的主要区别在名称和工商发展水平上，市镇一般工商行号和店铺更多。集镇和市镇具有四个共

①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6—34页。

② 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0，第41页。

③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任放：《中国市镇的历史研究与方法》，第75页。

④ 民国《茌平县志》卷2《市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0册，第81页。光绪《高唐州乡土志》的记述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集市与集镇、市镇的主要区别在集市规模和铺户数量上，其文曰：“以上六区皆街市之大者，遇集期则四方辐辏，商贾如云，平时贸易则本街铺户而已。谓之市，所以别于集也。”参见光绪《高唐州乡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04页。

同特征，即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以集散乡村农副产品、满足乡民日常生活为主要职能，有一定数量的店铺和铺户，人口数量较多。

以上四个共同特征既与“‘集镇’的概念应基于两个支点：一是产业活动的多重性，二是人口规模的确定性”^①的观点相一致，又能体现集镇的“中介性”，因此可以视为集镇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书将“集镇”界定为：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以集散乡村农副产品、满足乡民日常生活为主要职能，具有一定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的聚落。具体到1937年前的华北，以下四类聚落应可归为集镇：（1）以集散周边村庄所产农副产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主要职能，人口数量通常在1000人以上^②的聚落；（2）设有集市或常市，有一定数量的店铺或铺户，但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总人口中并不必然占有绝对优势的聚落；^③（3）因铁路运输发展和矿产资源开发而聚集了大量非农业人口，工商业较盛的聚落，如长辛店、周口店、坨里、阳泉、马家沟等；（4）在1927年前的较长时期发展水平接近集镇，1937年前虽然人口已达5万以上，具有较多的城市特征，但仍未成为县城和建制市

① 邹农俭等：《集镇社会学》，第5页。

② 在关于中国近代和当代集镇的研究中，人口在2000人以上常被视为集镇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在关于近代华北的调查和地方志中，不少人口在1000以上2000以下，甚至不足1000人的聚落亦被列入集镇之中，故本书将集镇人口下限放宽至1000人，以期更符合近代华北集镇发展的实际。调查中典型者如《全路各站附近乡镇调查表》，《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第363—399页。

③ 李伯重教授在《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一文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说明江南市镇中的大多数居民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非农化”比例较高，但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华北地区，似乎不宜刻意强调这一特征。毕竟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工商业相对欠发达的华北铁路沿线部分地区，以农业人口为主体居民的集镇仍然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在1937年前的京奉铁路沿线地区，既有以非农业人口为居民主体的长辛店、丰台、门头沟、秦皇岛等大集镇，亦有农业人口居多数的清河等大集镇；在1933年前的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仅有数十家商户的小集镇占有较大比例；在1933年前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的集镇中，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集镇（设有集市且有固定商户者）在数量上占有相当比例，其中不乏马牧集、朱集、曲兴集、张茅镇、会兴镇等人口多达数千的大集镇。参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9—22页；《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全路各站附近乡镇调查表》，《陇海全线调查》（1932年份），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汇编》第7册；等等。